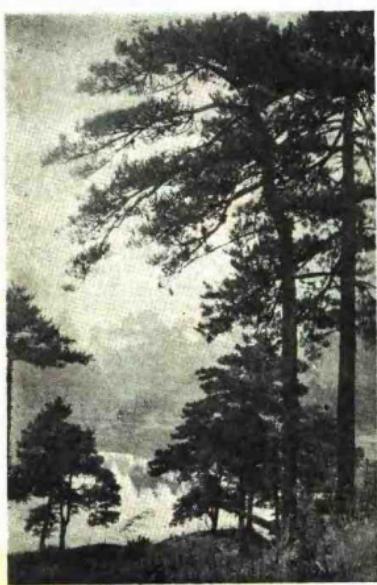


1908 纳



屏南文史資料

第 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屏南县委员会文史组



屏 南 文 史 资 料

第七辑 目录

- 饶司令员重游屏南老区 李鸿驰 (1)
张家镇烈士传略 转 载 (3)
老红军王启高革命回忆录 文史组 (5)
马来亚石山脚事件 江日生 (14)
郑队长会亲记 江日生 (18)
侨情拾零 文史组 (23)
回忆智知港日寇大屠杀 陈玉清 (27)
建国后我县三次测量土地简况 甘久滔 (29)
屏南的“国代”竞选 文史组 (37)
甘棠村史漫谈(续) 张作新 (39)
龙华寨与徐新胜 文史组 (45)
屏南旧习俗 文史组 (47)
笔架山奇观 叶振发 (51)
重建金造桥记 张 荣 (55)
清忠烈薛文潮纪事 薛仁流 (57)
张方矩轶事 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张运泰事略 张 荣 (58)
林冠勋传略 林枝露 (63)
老寿星——杨银钗 李鸿驰 (65)
张永芳的《漱漪斋诗集》摘录 张良来 (66)
柳 杉 倪一林 (74)

屏南特产——红曲	文史组 (76)
清代前塘的海纸	林枝露 (77)
莅任六个月被控十三款	甘久滔 (79)
辑录徐式庄旧作二篇	文史组 (80)
徐式庄简历	谢学钦 (83)
鲁迅日记中的屏南人	谢学钦 (85)
封二：原济南军区司令员饶守坤重游屏南老区	李鸿驰
封底：县领导访寿星	李鸿驰

屏南县印刷厂承印

一九八七年五月出版

饶司令重游屏南老区

李 鸿 驰

饶守坤，一个大名鼎鼎的司令员，在屏南县，凡是上了年纪的人谁不晓得他，老根据地就连下一代的也知道他。

饶守坤江西省人氏，从小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年未弱冠就参加革命。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大举围剿我根据地。中共闽赣省委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于翌年春成立了闽东北特委军分区。在闽北独立师任团长的饶守坤被任命为司令员。此后，饶司令同特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助、政治主任左丰美等同志进驻屏南仙山一带，领导了方圆数百里的建、松、政、浦、屏、古、瓯等地，人口近百万的闽东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游击战。饶司令员紧紧依靠当地群众，出生入死，出没在仙山、中秋、山峰一带和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为闽东北反围剿的胜利，为屏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十年过去了，饶守坤仍然是司令员，而是济南军区的司令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他没有忘记屏南、没有忘记老区人民、没有忘记和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七日和老伴山东省医大纪委副书记顾民同志、老战友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左丰美同志、福建省军区副政委钟大湖同志，专程来到屏南县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重游故地。

秋分时节，天高云淡，年逾古稀的饶司令头戴竹制太阳帽，身穿黄色制服，精神抖擞矫健阔步在山乡人行中。“他就是当年的饶司

令”一位陪同的屏南县领导向山峰村的干部做了介绍。老司令员和老区人民深情的双手紧紧相握，周围簇拥的群众听说是当年的老司令员，有的奔走相告，有的不时地向老司令射出敬佩和深情的眼光，有的端来了清甜的泉水，老司令员和老根据地人民都沉醉在相逢的幸福之中。

“你还记得那条山路吗？”“记得。当年我们送粮、送子弹、送伤员都是绕那条山路的”老司令员和当年的老同志实地回顾了过去游击斗争的生动情景，一桩桩军民反围剿的战斗场面饶司令员犹历历在目，随行的济南军区党史工作人员和福建省党史工作人员紧张地进行现场录音和拍摄。

九月七日这天下午，饶司令员一行，在屏南县仙山牧场场长的陪同下到了当年他们浴血战斗过的仙山，讲述开展游击战的生动经历，并以仙山的大坂遗留下的游击队的住房为背景留了影，以当年游击活动的水竹洋为景托照了相。老司令员他们在仙山重游时给仙山牧场以高度评价和肯定。饶司令员说：“仙山牧场不仅风光美，而且自然条件好，资源很丰富，可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养好牛、养好羊、养好鱼，为老区人民创造财富”。说话间，饶司令意外地见到了从五公里外赶来“会亲”的六十九岁的老游击队员占云金……。

张 家 镇 烈 士 传 略

张家镇同志生于1901年，双溪镇岩后村人。自小聪明机智，豪爽不凡。1933年闽北红军到屏南岩后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开辟革命据点，积极配合红军开展革命工作。1934年2月闽东党组织派吴华禄同志来屏进行革命活动，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展工作，组织贫农团开展革命斗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岩后党支部书记。同年七月，中共政屏中心区委成立，任区委书记。从此他不辞辛苦日夜为革命奔走在岩后一带。以贫农团为基础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

1935年6月，在阮英平同志亲自主持下，成立政屏中心县委，任县委书记。这时他发动群众打土豪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地进行各种革命活动，巩固了贫农团和党的组织力量。1936年国民党疯狂地向苏区大举进攻，他勇敢果断，坚决掩护苏区安全。保证了游击战争顺利开展。1937年国民党开始二次“围剿”，并采取“三光”（抢、杀、烧）政策。他临危不惧，英勇机智，坚持党的游击方针，屡次粉碎敌人的阴谋，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1938年正月，红军北上抗日，家镇同志仍留在屏南坚持工作，可是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留守处，并杀害我张达文等八位同志，同时再度向苏区进行围剿，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坚定地对同志说：“不要害怕，最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并对其母说：“妈，不要伤心，为革命流血是光荣的，即使我兄弟三人都牺牲，你把侄儿抚养大，在共产党领导下，仇是会报的。”在简短数语中显示出他对革命忠诚与坚强的信心。

家镇同志忠心耿耿，言行深感人心。一次在周宁茶园与左丰美等同志商议如何开展闽东革命工作时，被包围，他机灵勇敢，用新式长短机枪齐射，震撼敌人，突破敌人包围圈，保护了绝大部分同志的安全（仅牺牲了一位同志）。又一次，岩后革命根据地被反动派层层包围，他仍是关心照顾伤病员。炊事员何阿二逝世时，正是敌人逼在眉睫的危急关头，他还发动群众备棺收埋，使死者瞑目于九泉。他对同志之爱无微不至，对己身安危置于度外，品德高尚令人敬仰。

1936年4月，往寿宁找范岩寿同志时，在政和周宁交界之仙岩口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一家三兄弟（二弟达炳、三弟达文）。皆为革命捐躯，真是一堂三烈士，英名流芳，永垂不朽！

（转载县志通讯创刊号）

老红军王启高革命回忆录

文史组整理

我于一九三六年参加闽东游击队，一九三七年部队整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队旗是抗日义勇军六团）北上抗日。回忆在革命斗争的年代，有许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但因时间久了，有些地方难免有记述不清之处，还望知情的同志给予指教。

我原名吴贻余，村里人都叫我余仔，今年七十五岁，屏南县甘棠乡彩虹村人。记得我参加革命的年代，正是到处充满白色恐怖的时候。当时我父亲兄弟七人，全家共三十余人，为了免得家人受到株连，改名为王启高。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有刘发陆（即吴山口，老红军已逝世）、吴我基（改名吴一光，牺牲于建瓯，已追认为烈士）、吴贞户等四人，比我早些参加革命的还有吴贻族、吴贻文、吴贻薛、吴贻猴等。

我是从参加“王子会”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九三四年，屏南、古田农村盗匪群起，为了防御土匪的骚扰，许多乡村都组织起“王子会”。我的老家彩虹村于一九三五年也组织起“王子会”，我和村里二十多个青壮年报名参加，师傅是古厦村的陈国祥和洋头寨的甘国蓬。“王子会”敬奉王子仙，成员身穿黄色法衣，头戴八仙帽，胸前系八卦肚兜。每天早晨要在神坛前烧香、画符、念咒，晚上师傅教练拳术、刀枪。要素食清心寡欲，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虽然迷信色彩很浓，但当时对防匪却起了一定的作用。国民党政府有时也利用王子会抵抗土匪。我参加不久，就和村里的六、七个会徒跟着师傅被

调集到古田县平湖、凤埔一带防卫，在那里住了六、七个月，由古田县侦察队长余学明（红心白皮的共产党人）领导。枪枝是民团供给，吃、住、费用由国民党政府通知区、乡、保发给。

一九三五年十月间，余学明、陈国祥、甘国蓬等秘密带我们到周宁县的柿洋村（口述译音），会见了闽东游击队负责人叶飞同志。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师傅和余学明是共产党人。叶飞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身穿深灰色学生服，朴素年轻，和蔼可亲，讲普通话。回屏南时，叶飞同志派吴华禄（屏南地下区委书记）、吴华喜同志和我们一起回来组织地下游击队。从此，我们表面上搞“王子会”活动，暗中做扩大游击区工作，发展交通员，筹集物资、弹药支援游击队和侦察国民党军队行动等等。同年初冬，叶飞同志率游击队经彩虹村后山的开光坪集结后，向新田、庄田洋方向前进。十二月间阮英平同志要了解彩虹一带的情况，曾在我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为了避免外人注意，对外说是我古田的表哥。

屏南“王子会”的革命活动，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觉察。同时有人告密陈国祥、甘国蓬和我是游击队头头。幸而抓不到实据。一九三六年元月“王子会”约几十人护送闽东游击队的一位负责同志赴闽北，经我县寿山岔被国民党保安队用机枪阻击，陈国祥同志身负重伤，我们把他抬藏在山坑里，留下一个人护理。把路上的血迹揩净，不留痕迹，使保安队搜索不到。但他们很狡猾，却在附近隐蔽下来。当天下半夜，照料陈国祥的人，找了个老百姓，请他往古厦通知国祥的弟弟来山坑抬回养伤。同时约好来时以抛石头为接头暗号。不幸古厦抬轿来救国祥的人，到半路被埋伏的保安队抓走了，抬轿的人受了刑讯，把实情供认，于是陈国祥同志被捕。他大义凛然，只承认自己

参加红军，别的都不泄露，敌人在他的身上找不到线索，把他杀害于双溪。从此国民党政府认定了“王子会”与我们地下党有关系，开始取缔、禁止“王子会”活动，没收法衣、刀剑，解散组织。接着甘国蓬同志又被杀于棠口。两位死者都是我的师傅，黑名单上第三个名字就是我，于是就要抓我了。

来抓我的是熙岭人。因为他的弟弟当土匪被“王子会”打死，怀恨在心，向国民党政府告发我们，并亲自带领十多人，六、七支短枪，到彩虹村来抓我。一进村，这个人先到他姑姑家，问他姑姑说：

“余仔在家吗？”姑姑反问说：“找他何事？”因为是姑侄关系，他把来意告诉了姑姑。好在他的姑姑是我的堂婶。她的两个儿子与我亲如手足，她平日很疼爱我，听到抓我的消息，她赶快把熙岭的侄儿安顿下来，拿个酒壶去买酒，并到我家通知我立即离村。我戴上斗笠，插上柴刀，手持傍刀象个出去干活的样子离家，但又一想，他们抓人，村上路口肯定有放哨，不如先到保长吴我用家暂避。一来他们不会到保长家搜人，再说如果在保长家被捕，保长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因为“王子会”一定会抓他算账的。于是我决定逃到保长家。果然不出所料，保长把我隐藏起来。来抓我的人到保长家查问我的下落时，他还说我已到外地做工去了。躲了两天，我认为还是出外避一避好，于是就往建瓯乡下做短工（伐木场做工做笋干等）。同年十月，听到抓我的风声已告平息，才悄悄的返回老家。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在周宁柿洋村参加游击队当通讯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闽东特委根据上级的决定把部队集中宁德石堂整编，把闽东红军独立三师，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政委。由于阮英平到我家住了一个晚上，对我的情况很了解，所以

在我入党前交待许步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同年十二月五日由许步春（九班长）同志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部队从宁德石堂整编后，开到玉洋（洋中）过春节，然后驻我县棠口、双溪准备北上抗日。在棠口，我们住在基督教堂，三营营长黄培松穿上国民党军官的服装被叶飞同志批评了一顿，于是叛变（黄培松只有一个眼睛，人们都叫他“单眼”）；他带走了营部副官一人，七连姓张的连长一人，七连一排排长一人、指导员一人、班长二人。过了元宵节，我们就踏上抗日征途。下面叙述的是我在抗日征途中的琐碎记忆：

记得我们在北上抗日途中，曾在浙江石桥（口述译音）练兵。我当七班班长，我们营（三营）只有十多个党员，叶飞同志给我们上过党课。他平时讲普通话，但在上党课时，考虑到我们中有的人文化低听不懂，所以讲课时用普通话又用闽东方言讲解，使每个党员都听得明白。不久，队伍到了安徽，叶飞同志率领第一、二营驻在大、小茅山一带。我所在的三营归军部管辖。在一次反击日本的战斗中，我左腿膝弯中弹受伤，医治半个多月。伤好了，经过培训，调到新四军军法处搞保卫工作。

一九三九年半年前，国民党政府还发给我们军饷，下半年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但不发军饷而且妄图消灭新四军。他们派遣男女特务化装小商小贩，摆摊设点，挑货郎担，在军部驻地周围侦探军情。我们出门买东西，也经常化装老百姓。有一次，我穿着老百姓衣服去买香烟，跟一个卖香烟的小贩闲扯，他查问我某村有没有驻新四军？驻的是什么机关……。我回来向领导汇报后，把那个卖香烟的叫来审查。他承认是国民党特务，东北人。我们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他

进行教育后放回。军法处看守所四、五个月中，就抓到好几个特务，都是经过教育后给予释回。

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云岭，离日军占领区较近。一九四〇年九月，国民党驻兵全部撤走，让日本兵团攻新四军。在一次战斗中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紧跟着叶挺首长躲避敌机的空袭，我们躲在一片几亩大的坟地里，炸弹在坟堆爆炸时一块骨片飞到我的头部，右眼旁受伤，鲜血直流，头肿得很大，我又被抬进师部医院治疗了二十多天。

一九四〇年底，皖南事变前夕，军法处执法队一百三十多人奉令撤走。在我们撤出之前，已撤走两批，我们是第三批。沿途设有几处兵站，每过一站，都有秘密交通员给我们带路。从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我们在秘密交通员的带领下连续行军三个晚上。三十一日深夜，我们从宁国向滆湖方向进发，渡过对岸到溧士冈（口述译音）上岸，又继续向和桥附近前进，直抵太湖边。当时日本鬼子在太湖周围布防森严，等到我方预先潜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值班放哨时，我们立即准备渡湖。一九四一年春节晚上八点多，我们分乘三条大船渡过太湖，晚上风猛，船颠簸得厉害，大风张帆，八个钟头才穿过太湖，到对岸的地方（地名忘记了）上岸，走上山腰有个庙宇，地势高远望太湖的船只如鸭子一样大。

第二天梅司令派一个警卫班来接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前进，经过运河和京沪铁路抵武进（常州）。当天新二师师长谭震林同志就开会欢迎我们，晚上文工团为我们演出节目，老百姓送来慰问品。在欢会上谭师长说：“皖南事变，国民党说我们新四军全部被消灭，可是现在军法处的执法队回来了，大家欢迎……”。这时，我们才知道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领导同志已经调整，陈毅同志任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任军政委，邓子恢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首长们很关怀我们，陈军长曾打

电话通知各个师部：军部军法处执法队一百多人，经过任何地方都要保护好，沿途不能损失一人一弹，要保证全部到达苏北盐城。

元月五日（农历），谭师长同我们一起运军饷去军部。当晚九点多，大雪飘飘，我们冒雪乘船在江阴过长江抵苏北。老百姓看到我们头戴钢盔，身穿黄呢军大衣（都是从日本军队缴获的），腰插卜克枪象日本兵，以为是日本兵来了，都逃跑了。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没有跑的老人，把大衣里的臂章符号亮给他们看，说明我们是新四军，是抗日的军队，因为皖南事变撤回来。老人听了立即上山叫乡亲们回来，他们知道了是自己的军队，争着接待我们。六日早上到江阴兵站（离江阴二十多里）吃早饭。中午到如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准备做午饭，来还没下锅，老百姓来报告，敌人从如皋方面来了，谭师长命令我们赶快撤离。我们跑到海安县遇上一师，当时叶飞同志是一师副师长，于是我们在海安吃午饭后继续前进，第二天晚上到达盐城。

到达苏北军部，谭师长同我们分了手，他找首长汇报。我们到军法处报到后，仍然搞保卫工作。九月间我又见到叶飞同志，他已是一师副师长，到军部参加会议。我向他敬个礼，他问我一向可好，现在搞什么工作。我向老首长一一作了汇报。后来我又调到三师一个团部搞侦察工作。

三师师部在江苏阜宁陈集，是军事要地。周围有十几个日本鬼子的据点，他们的物资、枪支、弹药也集中在陈集。我们经常化装挑菜到据点去卖，侦察敌情，准备打下这些据点。苏北农村多数是茅草房，一天晚上，我们用火攻，把敌人据点的茅草房放起火来，晚上风大火势蔓延很快。敌人十几个据点同时受到我们的突然袭击，慌了，彼此不能救应，死伤很多。有七、八个日本兵逃了四十多里，被当地

人民发现，男男女女拿起锄头、菜刀、铁叉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日本兵还想作垂死挣扎，但我们人多势众，最后鬼子除一个受伤外，其余全部报销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在陈集战斗中，炮弹打在我的右腰部，跌进深沟里，腰部大量出血，左肺部碰伤、伤势严重，我又被送进医院治疗。住院一年后，病情稍有好转，我就边休息边工作，任事务长、管理员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向我们进攻。这时我在一师医院当伤兵队长，专门管理俘虏来的伤兵。日本投降时，被我们俘虏的伤兵，有国民党军队和汪精卫的和平军。我们向他们宣传俘虏政策，进行教育感化，不打不骂，允许他们和亲人通信，还给他们证明，让当地政府适当照顾他们的家属。在我们俘虏政策的感召下，俘虏兵多能真心实意接受改造，但也有一部分人态度很坏，打人骂人，惹是生非，我们就严加管教。有一次，十多个俘虏兵密谋逃跑，想逃往离医院七十多里的响水口地方，投靠和平军。我们事先已掌握了情况，在这些人临逃的晚上，集中全体俘虏兵，让他们揭发这些人平日胡作非为和企图逃跑的阴谋，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使他们悔悟过来，供认密谋逃跑的事实。最后，把两个顽固的，予以严厉制裁。

由于我肺部病情恶化，大量吐血，体重减轻，又住进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才逐步恢复。淮海战役结束后，我被分配在安徽滁县大成洋面公司军管小组当组长。这家公司是官僚资本家办的，资本家跑掉了，留下两个工人看家，我们接收时，厂里无人生产。于是我访问了公司附近居住的几家工人，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工人一个传一个，没几天就集中了几十个工人，

技术员也来了，我们恢复了生产。按八小时工作制，除工资外，加班的给加班费。工人病了，我们热情探望给予多方照顾。工人感动地说：“国民党宣传共产党许多坏处，说什么共产共妻等等。事实上，共产党才是为咱劳动人民着想的。”后来县里派干部来接管，我办好移交就离开，不久我旧病复发又住进医院。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的病情好转出院到南京，经组织批准返回福建老家。途中伤口痛得厉害。到上饶，通往福建的桥梁坏了，不能通车，于是，五〇年二月到江西南昌住进医院，在医院治疗五个多月。在医院里，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范式人同志的弟弟，他住在我病房的对面房间，交谈中我告诉他我是六团的，认识他的哥哥。他说他的哥哥现在江西省人民政府当副主席。他出院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范式人同志。范同志和省府邱主席等三、四个人到医院来看望我们，并说留我在庐山疗养院疗养。我说家有老母，归心似箭。从江西出院后，回到福建省立医院住院。后来又转到南平疗养院。党和政府十分关怀我们，医疗、生活多方照顾。省、地领导都来慰问。一九五八年十月，我离开福州康复医院。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建瓯荣军休养院疗养。一九六〇年二月结婚成家，时年四十九岁。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上级安置我回屏南定居。

回忆我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八年，在医院治疗期间，我的病情曾经三次危险，是党把我从死神中抢救出来，所以我的生命是党给的。

头一次在山东渤海海军区医院治疗时，服了朱医生的药大量吐血，生命垂危。以后转院治疗，医生是国民党的老医生（国民党七十师留用的），他是广东人，认我是他的同乡，在他的精心治疗下把我救活。

其次是在滁县大成洋面公司任军管小组长时，由于工作过于劳累，我又病了，住进和平医院休养。医生是国民党留用人员，他的小老婆管理药房，在苏打里放进玻璃碎片，企图害我。经报告院长（院长是我方派的），他批评了医生同时通知我出院。

最后一次是在福州西门外西禅寺直属医院（国民党肺结核医院）住院。医生是东北人，随解放军南下工作。他用国民党留下来的药给我注射，结果反应很厉害，抽搐、打摆子、吐血、发高烧。当时注射同样的药物的病员，曾死了三人（排长和两个战士）。我们把情况报告了卫生厅，叶厅长很重视，他亲自过问，嘱医生不要再用失效的药物，并指出，医生要保证治好病员，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从上述我三次病情严重被救活的情况，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我已七十六岁了，经医生诊断左肺部全部失去作用，只靠右肺维持生命。在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安度晚年。

(马)(来)(亚)(石)(山)(脚)(事)(件)

归 侨 江 日 生

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发生的石山脚事件，是在抗日战争年代，马来亚共产党和全国三大民族革命史上一次惨痛的事件。它体现出全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特别是中华民族在反法西斯战场上，为保护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中，始终顽强勇敢、宁死不屈的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也以铁的事实给残暴的日本侵略军严重的警告：革命的战火是无法扑灭，革命的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的力量是越战越强，敌人越残暴覆灭就越快。

石山脚，是马来亚的一个偏僻山区的华人小农村，背后与左右均系无法攀登的悬岩陡壁，形似粪斗。村里的群众觉悟高，革命组织强，是马来亚模范抗日游击区。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马来亚共产党，决定在这里召开较大规模的中央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共同分析形势，统一制订新的抗战方针、政策和路线，扩大武装队伍，更有效地开展全面的武装斗争，消灭敌人夺取政权。马共各州的地委领导、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个独立队的司令员，个别优秀的中队长都应邀列席会议。

全国各地的代表（除个别中央领导以外）都信心百倍，千辛万苦爬山越岭，按期到达。到会的领导、特别是武装部队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石山脚的地形非常不利，万一发生意外，就处于前方受敌人包围，后方无退路的绝境。特别是全国领导核心集中开会，更不该选择这样的地方。多数提出建议，要求尽快更换地址。到会的中央委员们